

“句吴”与“吴”

陆振岳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作为吴国名号的“句吴”与“吴”, 在先秦迄汉的载籍中, 仅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二者既有同一性, 又存在区别。前者是太伯的自号, 为俗辞; 后者为周武王给予的封号, 是中国之辞。不仅有元典的记载, 有经史的注释, 而且有相当的考古发现的器物铭文, 证据充足, 说理有凭。

关键词: 句吴; 吴; 俗辞; 中国之辞

作者简介: 陆振岳(1926—), 男, 江苏武进人,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方志学、吴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5)03-0129-05 **收稿日期:** 2014-12-17

研究先秦吴国的历史、文化, 绕不开的问题是对吴国名号的理解。毋庸讳言, 有不予辨别的, 还有误解的。因此, 对它作正本清源的缕析, 似有必要。

作为语词, “句(拼音 gōu)吴”与“吴”, 同是商末、西周至东周春秋后期存在一个地方政权的名号, 后人习称为句吴国或吴国。此时, “国”的含义, 据《孟子·离娄上》说: “人有恒言, 皆曰天下国家: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1]2718} 这与后世所指统一政权(实际是天下)乃至民族国家的国不同。“国”的繁体是“國”, 本字是“或”即域。《说文解字·戈部》: “或, 邦也。”段玉裁注: “邑部曰: ‘邦者, 国也。’盖或、國在周时为古今字, 古文只有或字, 既乃复制國字。”^{[2]631} 这个国是一统政权下的国, 吴国就是殷、周境内的区域政权。

“句吴”和“吴”, 考察古文献, 在先秦典籍里头, 无论《书》《诗》《礼》《春秋》及三《传》《国语》《逸周书》《世本》以至《庄子》《墨子》《管子》《荀子》及《论语》等, 凡涉及吴国史事的都作“吴”, 从未有称“句吴”的, 吴, 以《左传》最多见。“句吴”与“吴”并称, 最早见于汉人司马迁撰的《史记》, 此后, 见于记载的是汉班固的《汉书·地理

志下》^{[3]1667}, 几乎是照抄了《史记》原文。还有是晋、唐人杜预、颜师古、孔颖达等替经、史作注时有解释。此外, 从魏晋以下到近代, 即使是地方志如多种《吴地记》以及有关苏州的府县志, 也未有发现。

《史记·吴太伯世家》称:

吴太伯, 太伯弟仲雍, 皆周太王(即古公亶父)之子, 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 而有圣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 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 文身断发, 示不可用, 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 自号句吴。荆蛮义之, 从而归之千余家, 立为吴太伯。^{[4]1445}

这是“句吴”立国称号的由来。至于“吴”, 《吴世家》接着说:

太伯卒, 无子, 弟仲雍立, 是为吴仲雍。仲雍卒, 子季简立。季简卒, 子叔达立。叔达卒, 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 求太伯、仲雍之后, 得周章, 周章已君吴, 因而封之……列为诸侯。^{[4]1446}

由此可见, “句吴”与“吴”, 实体系同一区域政权的延伸。先是太伯的“自号”, 经至周章五世传递, 而后受周天子的封, “句吴”与“吴”是一脉

相承的,没有发生暴力变革。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何以“自号句吴”的太伯,却不是冠名“句吴太伯”,而称之为“吴太伯”?同样,周章“已君吴”的“吴”(在受封之前),也不称“已君句吴”?个中的原委,《史记·吴太伯世家》刘宋人裴骃的集解引三国时吴人“韦昭曰:‘后武王追封为吴伯,^①故曰吴太伯。’”既然本来是自号的“句吴”,因武王的封可以称“吴”,那么,周章继承太伯而君,自然也可以称“吴”了。韦昭以注《国语》而饮誉历史文献界,所说应有可信度。其实,韦昭之说原是援据《史记》而来,《吴太伯世家》就是称“吴太伯”。不过,司马迁省略了其中的原因。这种情形,《史记》里头是屡有所见的,别的载籍也有。无须列举,也举不胜举。在此,韦昭就给予补足了。

但是,又不能简单地将“句吴”与“吴”等同,两者的区别,是不能也不应模糊的。一些外来人员,进入并非荒无人烟的地区,而能建立政权,并“自号句吴”。之所以结出如此的硕果,因为:一是太伯、仲雍兄弟带领一个群体脱离了周部落所在的周原(今陕西关中西部岐山附近一带)^②,长途奔波,越过长江,进入荆蛮区域。带来先进的生产知识技能与文化(包含文字),如农耕与制造青铜器。二是太伯兄弟及其集体,善于尊重、吸取并融入土著文化,如一样断发文身,放弃原来的束发冠纓。二者的结合,促成一股外来势力站稳脚跟,与土著融合,乃至受到土著人的拥戴,从而建立政权,立号“句吴”,并尊为“吴太伯”。这个政权的特征,是“自立”并未经当时占有天下的殷商的批准,也没有得到那时周部族的认可。周章受封的“吴”,与“句吴”不一样,而和当时同样受周天子封的王室贵胄、功臣以及前代遗族一起成为诸侯之一。依据周王朝的定制,封有等级,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按级差授予不同的土地和掌握军队的数量。诸侯既受王朝的庇护,又受王朝的监督。要缴纳贡赋,提供兵源,以“屏藩周室”。

不仅如此,“句吴”与“吴”的不同,还在语言学的语词类别上呈现。这是要着重讨论的。

北宋人朱长文于《吴郡图经续纪》卷下《事志》说:“‘吴’,旧称‘句吴’,盖方俗之辞,犹‘越’之为‘於越’也”。这是绝少见到的宋人对“句吴”所作的词类的规定。但是,晋、唐人对“於越”和“句吴”的解释,与此绝异。《左传》定公五年《经》“於越入吴”。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以下简称杜注)说:“於,发声也。”唐人孔颖达的《春秋

左传正义》也认为“於”是发声。并说:“越是南夷,夷言有此发声”。^{[1]2139}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对《吴太伯世家》的“自号句吴”解道:“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於越’耳。此言号‘句吴’,当如颜解。”^{[4]1446}颜师古是唐初人,以注《汉书》著称。查《汉书·地理志下》“句吴”下有“句音钩,夷俗发声也,亦犹‘越’为‘於越’也。”^{[3]1667}那么,“句吴”为“方俗之辞”,简称俗辞,或者,“句吴”的“句”属于发声,究竟哪一说准确呢?由音韵的角度而论,一个汉字的组成是纽和部(后世出现的零声母除外),即声母(辅音)和韵母(元音),没有“发声”的成分。汉语的词语,有发语或称发端,如夫、盖、维。其实,“句吴”“於越”之类,有胶(或粘)着语的特征。“方俗之辞”(俗辞)是和“中国之辞”对应而来的,真实的含义,汉人已发其覆,朱长文之说,可能由此而来。《春秋公羊传》定公五年“於越入吴”,“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1]2338}。对于这种微言大义的语言,一时颇难理解。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解道:

越人自命於越,君子(按指《春秋》的作者)名之曰越。治国有状,能与中国通者,以中国之辞言之曰越。治国无状,不能与中国通者,以其俗辞言之……故谓之於越。^{[1]2338}原来,“於越”是俗辞,而“越”是中国之辞。“句吴”与“吴”的区分关系,完全与此一样。

进一步作探讨,和中国对应的是夷,讲俗辞的越人是夷人,吴人自不例外。有事实可证:《左传》哀公十二年,吴和鲁、卫等会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其后,“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1]2170}。有的注释者把“夷言”解为“吴语”。倘使把“吴语”理解成八大方言之一的“吴语”,那是不对的。因为吴方言不仅只是吴国人的语言,而况方言吴语是在东晋南渡后才被提出,而后逐渐发展成立的。此处所说的“夷言”,实际是当时吴国通行的语言。那么,吴人语言和越人语言一样,都是俗辞。但不能忽略,吴、越也有讲“中国之辞”的,中国也有“俗辞”(方言)。

中国和夷是有严格区别的。《礼记·大学》曾说:“四夷,不与同中国。”^{[1]1675}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伦理价值之中,夷人的披发左衽是受到鄙弃

①周章已封为吴君,为着对先辈的尊敬,自应给封,因太伯早已过世,所以是追封。

②没有一个集体,仅兄弟二人而要建立一番事业,是不可想象的,笔者在一篇拙文里曾述及这一点,此处不再展开。

的,夷语被讥讽为“南蛮缺舌”,不登大雅之堂的。

中国,在先秦的典籍中称“华夏”。《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孔《传》:“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孔颖达《疏》:“冕服采章,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1]185}又称诸夏,《左传》闵公元年:“诸夏亲暱。”杜注:“诸夏,中国也。”^{[1]1786}省称夏,《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2706}在那时,中国系指王畿即王朝的机构占据的区域和由周天子分封并直接掌控的诸侯国。后世还把中国称为中原,近世又有称中华或简称华的,境域也不断拓展。

夷和中国一样,也有不同的称谓。分别而言,《礼记·曲礼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1]1265}简称四夷,《尚书·虞书·大禹谟》:“四夷来王。”^{[1]135}或称夷狄,《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1]2466}又称戎狄,《诗·鲁颂·閟宫》:“戎狄是膺。”^{[1]617}或蛮夷,《尚书·虞书·舜典》:“蛮夷率服。”^{[1]130}并通称夷,《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1]2148}到了近代,夷的种种称谓,逐渐淡化和转化了。突出的事例,晚清办洋务,其间有称洋务运动。而这个洋务的名称,是由夷务转化而来的。从清政府官纂的《筹办夷务始末》一书,可以明了其中的信息。该书分别在咸丰六年(1856)、同治六年(1867)、光绪六年(1880)辑成《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审察三朝所记,道、咸两朝,大都称“夷务”,“洋务”只是偶然使用。而同治朝已一律改为“洋务”,为了整体的一致,全书以“夷务”冠书名,事实上可说是名不副实。

吴、越两国属于夷一类,但又有所不同。对吴国来说,从太伯、仲雍到周章的世系,是古公亶父的后裔,属周王室的成员,而且从《史记》将《吴太伯世家》位列世家类之首,显然不是以一般成员看待,而是在贵胄之列。司马迁的撰著,当然是有所本的。略如《吴太伯世家》篇末的赞语曾说读过《春秋》古文,别的篇章有明指出于谱牒的。至于司马迁任职的太史令任所,“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还有是广泛进行社会调查,访民间俗。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4]3293}《春申君列传》:“(黄歇)请封于江东……因城故吴墟(《正义》:“今苏州也。”)以自为郡邑。”《传》后“太史公曰‘吾适楚(吴为越所灭,越又为楚灭,吴地为三楚的东楚一部分,吴墟即今苏州,当然是楚的属地了),观

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4]2394-2399}对吴的历史陈迹,自然了然于胸。之所以能够与先秦到汉别的著述家不同,提出了俗辞的“句吴”之说,必然是言之有据的。

“句吴”,《左传》说是属于“夷言”,朱长文称之为“方俗之辞”,何休简称为“俗辞”,也就是方言。而“吴”则是“中国之辞”,所谓“中国之辞”实际是通行于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士大夫与统治阶级的上层,使用这样的语言,即语言学所称的雅言,近世所说的普通话。《吴太伯世家》“句吴”司马迁采用的是“俗辞”。而尊太伯为“吴太伯”的“吴”,那是周武王的封,周武王为统治当时中国的天子,出于他的封号,又是由史官记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另一说为“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这自然是“中国之辞”了。

总起来说,“句吴”与“吴”,存在共性,又别具个性,从几个角度提出论据和理由,应当说有足够的可信度。然而,不可避免地还存有可挑的刺。“句吴”的出现,由于只是司马迁一家之言,而将被看作孤证。

要对这一点作辨正,现在已有坚实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这就是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数十年来,考古发掘取得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以发现春秋时吴国青铜器的礼器、兵器而言,不下数十件。其中有铭文可核“句吴”与“吴”的达23件(还可能有遗漏),现据17件作统计:吴3见,攻吴1见,攻敌1见,攻敌9见,工虞1见,工虞2见。例如:

吴王夫差矛,1983年11月23日,湖北江陵马山砖瓦厂五号楚墓出土。铭文为:“吴王夫差自乍(作)甬(用)。”^①

攻吴王夫差鉴,光绪《山西通志·金石记》载:“同治中,代州蒙王村出土。”铭文:“攻吴王夫差择卒(厥)吉金,自乍(作)逌(御)监(鉴)。”^②

攻敌王夫差剑,1976年湖北襄阳蔡坡墓出土。铭文:“攻敌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③

攻敌王光剑,1964年,山西原平峙峪晋墓出土。铭文:“攻敌王光自乍(作)用鋈(剑)。”^④

工虞王剑,1983年1月,山东沂水县发现。铭

①参见《湖北日报》1984年1月8日载《稀世文物“吴王夫差矛”在湖北江陵出土》。

②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③参见《文物》1976年第11期《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

④参见《文物》1972年第4期,戴德遵《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

文：“工肅王乍(作)元已(祀)用……”^①

工肅太子姑发剑，1959年，安徽淮南市蔡家岗侯产墓出土。铭文有36字，开头为“工肅太子姑发……”^②

上引数端，跃然纸上的是：“句”和“工”“攻”相同，“吴”也一样可作“致”“敌”“虞”“戢”。

需要稍加说明，我国的汉字是由形、声(音)、义三者组合而成。有的字三者具备，有的只有其中一二项，因字而异。这里，只就相关问题扼要阐述。

训诂学有一条行之有效的法则，这就是相同声的字可以相互通用。所谓同声，从音韵的角度说，凡同纽的或是同部的，即同声母(辅音)、同韵母(元音)的(古无零声母，这里与“吴”同音的几个字，现在都作零声母)，都可以互通。

这样来看，“句”“工”“攻”三字的字形显然不同。从字义说，“句”，《说文解字·句部》：“句，曲也。”^{[2]88}“工”，《说文解字·工部》：“工，巧饰也。”^{[1]201}“攻”，《说文解字·支部》：“攻，击也。”^{[2]125}意义大有差别。再从字音来寻究，“句”“工”“攻”都属见纽，即同声母。就是现在的读音，普通话都作[g]。至于吴方言，不论文读或白读都作[g]。

再说“吴”“致”“敌”“虞”“戢”，先从字义看，吴，《说文解字·矢部》：“吴，大言也。”可以引申为大，所以《方言》：“吴，大也。”^{[2]494}敌，《说文解字·支部》：“敌，禁也。一曰乐器，控楬也，形似木虎。”^{[2]126}虞，《说文解字》未收。《广韵》等古辞书也没有收。《周礼·天官》四：“虞人，掌以时虞为梁。”贾公彦《疏》：“言以时为梁者，谓一岁三时取鱼皆为梁，以时取之，故云以时为梁。”^{[1]663}虞就是渔，虞人就是渔师。致和虞，《说文解字》等此字未收，先秦典籍也未见有此字。这和许多字一样，因别的字可常用，而被淘汰了。从字形和读音看，依照传统所说造字的“六书”之一的形声辨别，“吴”是从矢口，会意。敌从支吾声，是形声，以此类推，虞、致及虞都是形声。似乎“虞”与另外四字不相同，其实不然，单从字音说，吾又是从五得声，“虞”，从鱼得声，那么，“虞”也应是鱼得声。而吴、五、敌、鱼古音都属五部。就是声也全是疑纽。再从俗辞的音讲，现在吴、五、敌、鱼，吴方言的白读都读[ŋ]，显见还保留着古音。因而是可以互通的。

从句、工、攻的互通，以及吴、致、敌、虞、戢可以相互取代，那么，句吴、攻致、攻敌、工虞、工戢当然就是同一的了，并且不存在什么主次之别。

司马迁以特有学养，肯于作深入的社会调查，

获得旁人未发现的史料，《吴太伯世家》第一次提出“中国之辞”“吴”之外俗辞的“句吴”，这是必定持之有故，真实可信的。但是，司马迁的“句吴”，却没有提出任何的依据，但现今所得的考古发现的实物铭文可以作证。考古发现的历史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是宜侯矢簋(1954年江苏丹徒龙泉乡下聂村烟墩山出土)，器主即周武王封于吴的周章。铭文中的地名，研究者有不同认识。其间有“虞”与“吴”同一说。数量最多的器物而且铭文又有“句吴”一类的是春秋晚期阖闾、夫差时代的(这是就现今发现的说，以后还将会有出土)。

这里，需要极其简略地追溯历史。吴自太伯自号到周章被封，只有《史记》的寥寥数笔。太伯至寿梦十九世，从周章算起，也有十四世。遍查古文献，以及甲骨文、金文，都不曾记有关于这时吴史事的文字和篇章。不能忽略，在旧、新石器时代，吴所在的区域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当之无愧的是中华文化的发源之一。然而在新石器时代后渐渐地沉寂了，而周章至寿梦留下的也是一段空白。至于寿梦之后，略有记载的是春秋晚期的《春秋》及其三《传》，汉以后才有《史记·吴太伯世家》、表、书及相关的人物列传。《左传》最早记述吴事的是《宣公八年》(公元前601)：楚伐、灭舒蓼后“盟吴、越而还”^{[1]1873}，并未提到人物和事迹。《春秋经》记及吴事的是《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吴伐郟”“吴人州来”^{[1]1903}，同样缺少具体内容。而且比《传》文要迟16年。那位“始通于中国”而使“吴始益大”的王寿梦，即位是在成公六年(公元前585)。这与考古所发现的宜侯矢簋直到阖闾、夫差时才有更多的出土，几乎完全合拍。这不能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印记所在，成为主要轨迹的是“方俗”文化(包括俗辞)不断地向“中国”文化演进和发展。

极为重要的一点，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吴的区域有文字，几何印纹陶有类似图形的符号，仅此而已，并非系统的文字。又因没有与“中国”通，所以不可能留有完整的系统的文字记载，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固然有“夏夷之辨”的偏见，轻视被看作蛮夷之邦的吴。无史料而无事可记，也是无法忽视的事实。吴到了《左传》宣公、成公的年代，寿梦始通中国以后就不同了。先是晋国的楚亡臣申公巫臣使吴，“教吴用兵乘车”，军事

①参见《文物》1983年第12期，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发现工虞王青铜剑》。

②参见《考古》1963年第4期，安徽省文化局工作队：《安徽省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堆战国墓》。

面貌有如此的变化,吴便开始伐楚,直到阖闾、夫差,对楚、越、齐的战争不断,而且取胜的多,终于称霸诸侯。在文化上,著名的有公子季札先后聘于鲁、齐、郑、卫、晋等“中国”的诸侯国,观乐、吸取政治文化的有益因素,《吴太伯世家》是有详细的记载可据的。还有别的,例如青铜器物,从冶铸到制造,其形制主要的是学习“中国”而来。尤其是铭文,这在吴国有成文记载的开端后,也大量地应用于通行于“中国”的金文(包括六国文字),其中可能也有模仿而创造的,如工廬等。但谈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没有能超越或根本摆脱形、声、义结合的体式。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商榷、讨论。20世纪30年代,浙江、江苏、上海的几位学者,对已有的当地历史文化遗址、青铜器和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展开研究。1936年8月在上海成立吴越文化学会,蔡元培为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汇集一批著名学者,对吴越文化的研究取得开创性的贡献,如良渚文化的名称,就是该会成员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发现漆黑色陶器而得。由此推动了吴越文化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但因为在初创阶段,难免也有值得商榷的问题。有关吴国的名号便是其中之一。柳诒征著文《说吴》,认为“吴之名起源于吴山”^①。卫聚贤有《太伯之封在西吴》^②。顾颉刚也说:“吴之名,当由陕西之吴岳而来。”^③所说语言有些差异,而相同点则是吴国的建号是据陕西关中平原西部的吴山而来。卫聚贤还以为太伯曾受古公的封,封地就在陕西的吴山。但并没有提出足够可信的证据。

查考人类语言的源流,是先有语言,而后相继创造不同样式的文字。有独立创造的,有借鉴别的文字而创的,也有使用别人的文字,还有至今尚没有文字的。“句吴”之所以是俗辞,那是根据当时吴地基层群众的口语用中国通用的文字记录下来的。因为在吴(扩大至蛮夷)未创造有文字。而中国之辞的“吴”,系何休所说的“君子”之类,在使用文字时,根据自己的意志和需要,创造新字或者将已有的俗辞吸收改铸而来。“句吴”

就是这样的产物。基于荆蛮人口语而来的俗辞,是有据可查的。汉人刘向著的《说苑》卷十一《善说》载有一段《古越语》,而荆蛮之地古来便是百越分居之地,古越语自然就是当地的土语、方言。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语言学、史学、文献学等学术界,对古越语的研究有长足的发展。共同认为:屡见于记载的,原吴、越人的地名、人名有句吴、句章、句乘、句甬、余杭、余姚、於越、於潜、无余、无锡、夫差、夫槩、句卑、诸樊、余昧,等等。并把研究成果应用推广。无疑是对“句吴”本是方俗之辞的有力的肯定。

极为清楚,俗辞的“句吴”是完整的一个词,不能阉割,也不能省称,不能用词的或前或后的任何一个字,独立成为相同意义的一个词。再是考古出土的“句吴”,同义同音的有5种写法,频率最高的是“攻敌”,不能说只有“攻敌”可取,以至用“敌”取代。同样,“吴”不就是“句吴”。并且,5个异形词同音又同义的“句吴”,确实同源于古越语,系通行于当时荆蛮之地夷人的口语。没有因为周天子的以吴相封,而停止使用。恰恰相反,自周章起至寿梦14世,再加诸樊、余祭、余昧、僚、阖闾、夫差6世共20世,不仅没有废俗辞而改用中国之辞,而是以吴为号的较少,乃至在夫差的年代还是这样。推究其原因,重要的不外有二:一是社会的任何一种事物的名称,一经成立而为世所公认和采用,就有相当的凝固性,不是轻易能改的。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如苏州的地方建的名称,宋代有一段时间为吴郡,宋以后就没有了。但是两宋以至明清时代,仍有以吴郡相称的,并且还见之于地方志的标目。而况在吴国境内已通行的口语,到春秋晚期仍然在通行。二是“句吴”为该政权的首创者太伯所自号,又得国内上下、外来与土著人员的一致拥戴,使用俗辞已多世相传、一脉相承,就不足怪了。是否多少还有一点怀敬祖先之意亦在所难免吧。

①参见《史学与地学》,1927年第2期。

②参见《江苏研究》,1937年6月,第3卷,《吴越文化专号》。

③参见《苏州史志笔记》之十八《吴国迁徙路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参考文献

-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0.
-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杨雅婕]